

國際救援組織工作者：我從「敘利亞難民潮」看到香港人的身影

我沒有想過，會寫一篇關於敘利亞難民的文章，直到「史諾比」致電給我。他是我認識了二十年的朋友，在一間國際救援機構服務，每當遇上天災人禍，就會向社會呼籲捐獻，遠赴海外賑災。我硬着頭皮應約，擔心自己不了解中東局勢。怎知史諾比在話筒說：「我就是想說，從這件事我聯想到香港。」史諾比曾經做過記者，知道如何把我引誘出來。

文：譚蕙芸

就這樣，我們相約飯局，我坦言，自己不了解敘利亞。史諾比對我很「包容」，他解釋，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有「中東巴黎」之稱，曾經繁華，內戰前也有香港旅行團到訪。網上可找到內戰前後before 和after 的對照相片，舊照裏，大馬士革車水馬龍、樹影婆娑，幾年烽火之後，城內留下危樓彈孔，20萬人喪生，國際救援人員也難以申請簽證入國。

敘利亞難民題目「不夠juicy」

敘利亞自2011 年局勢開始不穩，2013政府軍出動化武對付平民，史諾比向港人呼籲捐款已兩年多，但反應冷淡。他說，四川地震、南亞海嘯、日本地震，捐款往往以億計，敘利亞卻是「票房毒藥」：「我們打電話給企業，他們以前會一次過十萬廿萬豪氣地捐，但聽到『敘利亞』就反問我『咩嚟？』；有一間香港英文傳媒曾在2013 年派人到約旦採訪難民營，但中文傳媒對這題目是『睬你都傻』」。

套用傳媒術語，敘利亞難民題目「不夠juicy」，即使西方傳媒也逐漸失興趣，間接導致去年NGO 獲得撥款大減，史諾比說，收容敘利亞難民的約旦、黎巴嫩等難民營生活條件變差，支援親友收容敘利亞難民的津貼也削減，難民於是有誘因離開中東向歐洲出走。然而這個「出走」並不容易，史諾比舉例，最熱門的一條逃生路線，由土耳其到德國（2000 餘公里），差不多等於香港行路上北京：「我看過一張照片，難民營地下有六對鞋，屬於一個家庭，從成年人到嬰兒鞋都有，這些鞋破爛得很，我難以幻想他們走了多少路，才能到達難民營稍作休息。」

喊破喉嚨，也沒有人感興趣，卻因社交媒體出現一張照片，形勢逆轉。月初因為三歲男童Alan Kurdi 伏屍土耳其海灘照片曝光，一夜間，整個社交網絡，人人忽然關心敘利亞。我很有興趣，究竟一個資深國際救援組織工作者，會否覺得這種熱潮很膚淺？史諾比看得細緻：「網絡上有些難民照片，充斥着大批屍體，或者衣衫不整，我不贊成分享這種照片，因為是對死者不尊重。試問和死者相關，或有類似經歷的人看到，會覺得怎樣？相反，那張小男孩的照片卻能保持一種尊嚴，好像一個普通的孩子睡着了，亦沒拍到他的臉的正面，卻能表達出一種傷感，勾起人們關懷，是一張有dignity 有empathy 的照片。」史諾比的臉書平日甚少帖文，也罕有地分享了一幅小孩抱着小熊睡熟牀上的悼念畫作。

憂討論焦點偏重歐洲

可是，熱潮過後，史諾比卻擔心討論焦點太偏重歐洲：「能夠到達歐洲的難民是比較幸運的一群，他們較有資源，而且安全抵壘，只是整個問題的『冰山一角』。敘利亞原有國民多達2000 多萬，400 萬人離國，當中大部分人滯留在中東在鄰國約旦、黎巴嫩，這批人也前路茫茫，但至少安全；最不幸是仍留在國內的千幾萬人，當中有700 幾萬人流離失所，生命時刻受戰火威脅。」700 萬人，相等於整個香港的人口。史諾比的組織，在敘利亞境內仍然提供醫療服務，幾年間有數十名職員殉職。

與敘利亞為鄰的國家，像約旦、黎巴嫩、土耳其，收容百萬計敘國的難民，部分搭建了封閉式難民營，部分難民自成社區，也有難民經濟能力較佳，可以在當地買房子、或送子女到當地學校，也有難民做黑市勞工掙生活費。史諾比曾到訪約旦難民營，乘車期間與一位約五十歲的男司機閒聊，「我只是問那位司機，覺得敘利亞難民怎樣，怎知他十分激憤，覺得難民搞亂當地社會，分薄了當地人工作機會、把租金搶貴，孩子上學時段也縮短了。」史諾比坦言，當時自己明明身在中東，忽然以為自己在香港：「那種論調是那麼熟悉，就像一些香港人投訴內地人把奶粉搶

貴，房子炒貴，資源分薄。」令史諾比訝異是，那位約旦司機最後承認他和難民有血緣關係，原來司機的母親來自敘利亞，「他形容：『我的身體流着是敘利亞的血』，但也不減他對難民的厭惡。」我和史諾比你眼望我眼，同時想起，香港有不少人的上一代來自內地，也是因戰亂走難來香港……。

難民身分非與生俱來

史諾比很感慨：「雖然敘利亞好像很遙遠，宗教政治背景複雜，但不管你是不是難民，只要是人，你關心的問題都一樣：兒女讀書，住屋，食物，醫療需要，其實人和人很相近。」和史諾比飯局期間，令我意外的是對「敘利亞難民」形象改觀。普遍人想起「難民」，會有種「非我族類」的想法，腦海會出現「衣衫襤褸、身無長物」的畫面，然而，難民這身分不是與生俱來的。未打仗前，敘利亞也繁華過，據報道，有高教育水平的難民之前曾在德國工作，也有人在西方國家有親友（溺斃小男孩Alan Kurdi 就是想投靠溫哥華的親戚）。雖然法例上，移民和難民定義不同，但史諾比覺得，廣義上兩者差異不大，心態都差不多：「除了少數原居民，在香港誰不是難民的後代？1949年南下香港開廠的上海商家，也是難民一種。」正正因為「難民」是環境因素引致，裏面有富人也有窮人，只要政局不穩，投奔異國不是落後國家人民的專利。史諾比覺得，九十年代因為中英談判令萬計港人移民，也是同一種心理。筆者曾移民加拿大，對該國接納不同文化背景人士的社會氣氛，深感慶幸。史諾比覺得，今日香港政治氣氛緊張，有人提出移民台灣，為孩子教育移民海外，「想為自己和下一代尋求更好的生活」，就是人性的共通點。

「包容」需要時間代價

然而，經濟發達國家今趟最不願意接收難民，承受最多敘利亞難民的，多是中東周邊國家，如黎巴嫩接濟的難民數目（184 萬）竟佔其總人口（484 萬）近4成。相反，歐洲發達國家每國只收10萬或以下。不過，對於匈牙利總統Viktor Orbán 指出，「因為歷史背景，我們不想和大量回教徒一起生活」，史諾比的觀點卻令我意外：「我覺得這句說話好誠實，可以接收難民固然好，若勉強接收，社會卻不能接納也不是好事。」我半認真反問：這就對難民不夠「包容」了？史諾比笑一笑，淡然說：「『包容』是一個過程，需要時間和代價。」

我和史諾比的對話，常出現「包容」。「包容」已成為香港社會裏的貶詞，用來取笑「滿口大愛的離地左膠」。從事國際救援工作的史諾也自嘲：「我們這些人，當然是傾向左膠……」他說，朋友圈裏有不少歐美做救援組織的人，主張先進國家要接收多點難民，但另有一批人不認同，近日雙方吵得面紅耳赤。史諾比留意到，臉書裏歐美朋友間出現了「unfriend 潮」，對是否接納難民針鋒相對：「一邊是認為西方社會有人道責任接收敘利亞難民，另一邊則覺得難民是貪錢、是恐怖分子、不是那麼慘，分薄了本地人資源。」因為政見而和親友unfriend 割席，也是多麼熟悉，去年香港雨傘運動期間也出現過，或許也是人性共通點的一種。

問

譚蕙芸，香港還有「越南難民」的日子已出世，懂得背誦收音機「北漏洞拉」的廣播，童年在電視看過越南難民營騷動新聞，記得當時有人批評越南難民為港府造成財政負擔，也記得後來越南船民被抬上飛機遣返。長大後讀電影研究，看許鞍華的電影《投奔怒海》，才知道許大導有意無意把船民面對越共和港人面對九七的命運連結起來……九七前，自己也嘗過移民外國的滋味。

答

史諾比，內地出世，香港長大，做過記者，轉戰國際救援機構服務超過十年，曾到緬甸、海地、中東等國家救災。史諾比的朋友中，有人在三十年前從廣東偷渡來港，「他們幾兄妹也只有幾歲大，要在深夜海域逃亡，經歷就好像今日敘利亞人從土耳其經水路去希臘一樣」。